



刘
颀
著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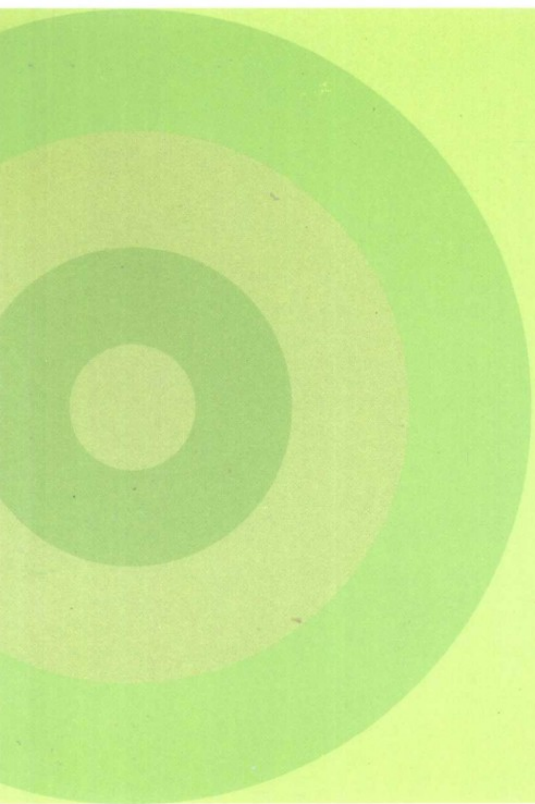
——释宝唱与《比丘尼传》

梁代释宝唱在其约七十余年的生命中，勤勉刻苦，撰述繁富。参与编辑以及独自撰著书籍多达十八部，八百四十余卷。他是中国佛教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撰写了比丘传记，又创作了比丘尼传记的佛教史传作家；同时，《比丘尼传》的出现开创了为中土比丘尼立综合性传记的先例，释宝唱与《比丘尼传》在佛教历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岳麓书社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研究

岳麓书社

——释宝唱与《比丘尼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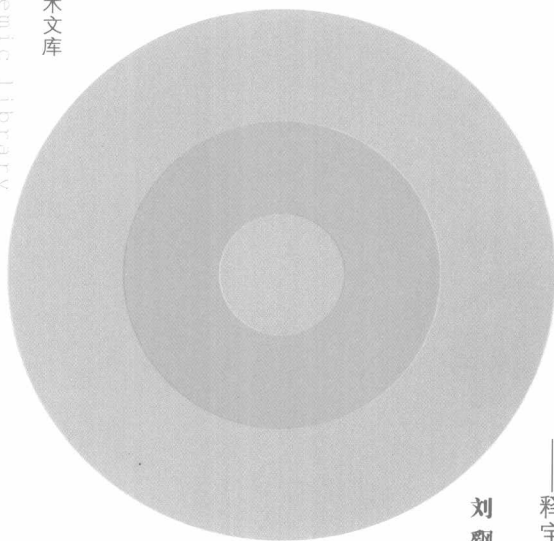
刘飏 著

本书是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2009q156) 成果

YOUTH ACADEMIC LIBRARY



青年学术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研究:释宝唱与《比丘尼传》/刘颢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9

(青年学术文库)

ISBN 978-7-80761-238-4

I. 魏... II. 刘... III. 佛教徒—传记—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6298 号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研究:释宝唱与《比丘尼传》

作 者:刘 颢

责任编辑:邓 翊 黄金武

封面设计:萧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

字数:190 千字

ISBN 978-7-80761-238-4/G·708

定价:16.00 元

承印: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现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曾列《南北朝释教撰述》一章，详论当时佛教撰述之丰富和发达。他把当时的佛教撰述总结为“注疏”、“论著”、“译著撰集”、“史地编著”、“目录”、“伪书”六大类，而在论述“史地编著”时则说：“中国僧传，为两晋南北朝最发达之史书。”

汤先生的这句话，我觉得除了要说明当时中国僧传的发达之外，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僧传文体性质的看法，即他是将僧传视为“史传”或“传记”来看待的——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僧传应该就是当时的“史传文学”或“传记文学”作品。

因“史传”或“传记”同时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质，而中国又是一个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所以，“史传文学”或“传记文学”这种形式的源头，也就是非常久远的。《隋书·经籍志》著录历代史书，在“正史”之外，又有“古史”、“杂史”、“霸史”、“地记”、“杂传”等多类，认为这些史书“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还将史传的源头上溯到了三代及孔子著《春秋》，说：因孔子的《春秋》一书，“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到汉武帝时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此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著为《史记》，于是纪传体的史书便正式诞生了。清代编《四库全书》，又将《隋志》的史书类目进行并省，单列出“传记”一类，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传记类二》云：“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并举《晏子春秋》以为“传”例，举《孔子三朝记》为“记”之权舆。现代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四库提要叙讲疏》一书中，对《四库总目》的这一说法予以了辨析，他说：

如但见其（指《晏子春秋》——引者）叙事为多而遽谓家传之始，而《管子》一书亦复类此，岂可尽目为传乎？《汉志·六艺略》“论语类”有《孔子三朝》等七篇，乃孔子对鲁哀公语。三朝见公，故云三朝……所谓记者，记一时所语也，自与叙一事之始末者有不同矣。《四库总目叙》乃谓此记之权舆，非也。博征载籍，则传记开创之功，应推司马迁之书为最早。以“本纪”记人主之事，“世家”记诸侯之政，“列传”记公卿贤者之所为以及边裔地区之事物，由是传记之体始备。

张舜徽先生还认为：“自两汉以逮六朝，传记之作大兴。《隋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可谓盛矣。”而《四库总目》“于历代高僧、地方耆旧之传记，概不之及，则亦未为全备也”。

汤用彤先生认为两晋南北朝的中国僧传，为当时“最发达之史书”，张舜徽先生也认为六朝的高僧、地方耆旧之传记“可谓盛矣”。他们都超出了封建正统历史学家的局限，而看到佛教僧传这一新兴史传品种在中国古代“传记”著作中的地位，这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只是由于著述体例的局限，汤、张两位大师都未能就僧传在中国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展开更充分的申述。而今天的学术界，无论在中國大陸、港台还是海外，已都有不少关于中国僧传（如《高僧传》）研究的专著出版，这可以说已是沿着大师们的思路，又朝前迈进了一步。

但是，在中国两晋南北朝的僧传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当时除僧人传记（比丘传）之外，还出现了专门记比丘尼事

迹的传记。梁代释宝唱的《比丘尼传》，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开山之作。

在《比丘尼传》之前，中国的传记中虽也有专记女性的作品，如刘向的《列女传》和历代“正史”中的“后妃传”等。但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男权中心的时代，后妃们只是以帝王配偶的身份入传，《列女传》中的女性也只以“某某之妻”的身份出现，同样生活在男性的羽翼之下。《比丘尼传》中的女尼则不同，她们既不是男性的附庸，也不是“三从四德”的典范，而是一群以执著的追求和坚定的信仰而名世的女性。这多少透露出了一丝独立人格的曙光。

本书是刘颢君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专著。几年前，刘颢赴桂子山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他为人朴实，勤勉好学。因为我曾正为建立一门“中国佛教文学学科”而努力，刘颢闻风而悦之，遂选择了释宝唱的《比丘尼传》研究这一前人较少关注的问题，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并写下了这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成绩，一是他抓住《比丘尼传》作者生平事迹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考辨，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二是他结合当时佛教史和社会史，探讨了《比丘尼传》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三是他把《比丘尼传》与当时的僧传、正史、小说、类书、墓志等加以比较，说明了《比丘尼传》的史料来源；四是他对《比丘尼传》的流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出了系统的梳理。

刘颢的这篇论文，在评议和答辩时，评议专家和答辩委员们一致表示了肯定，顺利通过了答辩。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该论文已臻于完善，其中应还有不少有待进一步深入、细致探究的地方。学无止境，科学研究也没有尽头。愿以此与刘颢君共勉之。

是为序。

高华平

2009年春于武昌桂子山

目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比丘尼传》作者宝唱生平与著述	010
	第一节 释宝唱的生卒年及其家庭状况	010
	第二节 释宝唱与《定林寺藏经录》	014
	第三节 释宝唱的著述	017
	第四节 《名僧传》成书时间考	042
	第五节 释宝唱年谱	046
第二章	《比丘尼传》的成书原因	073
	第一节 梁代佛教是南朝四代中佛教发展的极盛时代	074
	第二节 梁代比丘尼实际地位的考察	078
	第三节 梁代是僧侣传记创作最发达的朝代	089
	第四节 南北朝之前女性传记书目	101
	第五节 宝唱撰述《比丘尼传》的个人能力和主观愿望	116

第三章	《比丘尼传》的史料来源	123
	第一节 《比丘尼传》没有为之立传的魏晋南北朝比丘尼事迹辑录	123
	第二节 宝唱《比丘尼传》史料的来源	143
	第三节 《比丘尼传》与《宣验记》的关系	157
	第四节 《比丘尼传》与《冥祥记》的关系	159
第四章	《比丘尼传》的流传及影响	170
	第一节 佛教教内和教外书籍对《比丘尼传》的著录	170
	第二节 《比丘尼传》对后世僧传写作的影响	174
	第三节 《比丘尼传》所载古代比丘尼的风范	177
	结 语	182
附录	一、有关释宝唱与《比丘尼传》研究的文章及书籍索引	184
	二、《比丘尼传校注》校点商榷	191
	三、《高僧传》作者释慧皎谱略	198
	主要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5

绪 论

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从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中国佛教历史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灿若明星的高僧大德，他们维护佛教、宣传佛教、弘扬佛教的事迹和功业被教内以及教外的史学家所记录，以至流传至今。其中，最系统地记录高僧历史的书籍是肇始于南朝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后代续续不断的《续高僧传》系列。依照时间顺序，分别是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明释如惺的《大明高僧传》，明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民国喻谦的《新续高僧传》。^①毫不夸张地说，将历代《高僧传》连贯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佛教史。但是，这一代代相续，洋洋洒洒数百卷的《高僧传》记录的只是出家二众之一的比丘的历史，而作为出家二众之另一半——比丘尼几乎是没有任何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作为出家女性的比丘尼，在佛教僧团中的地位历来低于比丘，这主要是由佛教本身制度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所影响决定的。因而，至今系统记录比丘尼事迹的典籍资料，从数量上来说，是无法与数百卷的比丘传记相提并论的。根据佛教教内和俗世文献的记载，关于中国

① 关于后续《高僧传》的名称：清末杨仁山居士于光绪十年（1884）刊刻慧皎的《高僧传》，在原序后的识语中，提出将梁、唐、宋三部僧传易名为初集、二集、三集，另编四集以相续的看法。

古代比丘尼的综合性质的传记，只有一部，即梁代比丘释宝唱撰述的四卷《比丘尼传》。^① 因此，宝唱的《比丘尼传》在学术和史料上的价值就显得尤为珍贵了。迄今为止，僧俗两界对有关比丘的传记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汤用彤先生校注的《高僧传》，最近几年又陆续涌现出了对《高僧传》展开研究的近十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②；我国台湾以及国际汉学界对高僧传序列的高僧传记研究也是成果颇多^③，而真正系统地对《比丘尼传》展开研究

-
- ① 佛教教内和俗世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古代比丘尼的综合性质的传记：《释氏稽古略》卷二有：“（东晋废帝太和三年）释慧常译《比丘尼传》六卷。”从“慧常译《比丘尼传》”来看，此《比丘尼传》应该是慧常翻译佛典中有关古印度的比丘尼的事迹而辑录成书的，不是关于中土比丘尼的传记；《隋书·经籍志》中有：“《尼传》二卷，皎法师撰。”《尼传》即是《比丘尼传》，“皎法师”乃宝唱之误也。本书第四章中对此问题有详细的考证。另外关于《神尼传》以及宝唱《比丘尼传》中提及的比丘尼传记都是属于单篇传记，非综合性的传记。《续比丘尼传》是民国时期的释震华所撰一部比丘尼的综合性传记，它属于近代的撰述。
- ② 研究《高僧传》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方梅《〈高僧传〉艺术论》（浙江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许展飞《〈高僧传〉研究》（华南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黄先炳《〈高僧传〉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纪赞《〈高僧传〉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鲍金华《〈高僧传〉副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许卫东《〈高僧传〉时间副词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
- ③ 我国台湾以及国际汉学界对高僧传序列的高僧传记的成果：台湾主要有郑郁卿《〈高僧传〉研究》（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徐燕玲《慧皎〈高僧传〉及其分科之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辑刊》初编第二十六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释果灯《唐道宣〈续高僧传〉批判思想初探》（东初出版社1992年版）。国外主要有美国学者阿瑟·F·怀特的《人物传和圣徒传：慧皎的〈高僧传〉》（Arther F. Wright, “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iao’s Live of Eminent Monk” the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ho），柯加豪《高僧——中世纪中国〈高僧传〉中的佛教思想》（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夏威夷出版社1997年版），日本学者山内晋卿《支那佛教史之研究》附有《〈高僧传〉研究》，牧田谛亮著《中国〈高僧传〉索引》第一卷有梁《高僧传》索引，以及他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三）》第一章《论〈高僧传〉成立》等都是《高僧传》的研究专著。

的书籍目前只有一本，即王孺童先生的《比丘尼传校注》，因此，关于《比丘尼传》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去探讨和挖掘的地方。以下对《比丘尼传》的研究现状作一个总结。

青年佛教学者王孺童先生历时七年完成的《比丘尼传校注》，是一部关于《比丘尼传》研究的重要著作。王先生的“校注”以《大正藏》作为底本，除了对藏内的《比丘尼传》原文进行了句读，并且以十余种版本的《大藏经》进行了校勘，它们是：《金藏》、《高丽藏》、《资福藏》、《碇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频伽藏》。在校勘的基础上，作者对《比丘尼传》涉及的史实、人物、寺院等进行了考证，并将见于其他书的相关资料收于每一篇传记后的“附录”中。在该书的《前言》部分，是一篇三万余字的系统研究《比丘尼传》的论文。作者以宝唱与《比丘尼传》、《名僧传》与《比丘尼传》、尼始、尼坛、尼寺、尼讲、尼正、尼衣、尼诗、净土信仰、观音信仰、佛道之争为小标题对这十二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对历代经录、典籍著录《比丘尼传》的分卷相异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比丘尼传》应该是四卷，解决了一个学术疑难。^①对于其他的问题，王先生是从比丘尼发展史的角度探讨源头。诸如第一位出家的中国比丘尼应是谁；尼坛受戒于何时；第一座尼寺何时何地何人建立等等。在《比丘尼传》的研究上，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蔡鸿生先生的《尼姑谭》一书下编为《〈比丘尼传〉评说》，“以比丘尼出家因缘为重点，按卷逐传略加评说。先录传文，后加评语。间有注释或订正”^②，也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比丘尼传》进行研究的成果之一。

吴季霏的《〈比丘尼传〉研究》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专

① 参见[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页。

② 蔡鸿生《尼姑谭》，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门以《比丘尼传》作为论述中心的文章。该文分为五个小节，前两个章节分别是“作者生平及撰述背景”和“立传以彰显尼僧的德性为主”。关于宝唱的生平形迹问题，吴季羣只是依据《续高僧传·宝唱传》中的记载，简略叙述了宝唱的一生，对其生卒年、交游行迹、著述等问题没有加以辨证，“立传以彰显尼僧的德性为主”一节，吴季羣探讨了宝唱撰述《比丘尼传》时选择传主的标准。后面三个章节吴季羣用《比丘尼传》中的史料，论证了“比丘尼戒律在中土传播的过程”、“早期比丘尼宗教行为的趋向”和“比丘尼参与政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三个关于比丘尼的历史发展的问题。总之，吴季羣的《〈比丘尼传〉研究》一文充分体现了宝唱的《比丘尼传》中的历史史料对于研究比丘尼僧团发展以及比丘尼的相关问题的重要价值。

充分利用《比丘尼传》中记载的宝贵史料来研究有关问题的文章和书籍是《比丘尼传》研究中最多的。涉及这方面研究的书籍主要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和东晋南方的寺院》一节，就是利用《比丘尼传》中的相关人物的传记的史料得出“西晋时期中国内地出现了最初的比丘尼”这一结论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专门撰写了《比丘尼传》一节，编者也认为《比丘尼传》中比丘尼的事迹“对于研究东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奉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镰田茂雄的《简明中国佛教史》、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杜继文的《佛教史》等佛教史著作都认识到了《比丘尼传》的史料价值，在其著书立说中都加以利用。荷兰许理和撰著的《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适应》和法国谢和耐著《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在大量利用《高僧传》的史料的同时，对《比丘尼传》中的史料也有摘用。利用《比丘尼传》中的史料来进行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文章，共有二十多篇，其中包括四篇很有价值的硕士论文。李

玉珍的《唐代的比丘尼》是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李玉珍在《比丘尼教团研究》一章里利用宝唱《比丘尼传》中的卷一《净检传》和卷二《慧果传》、《僧果传》里的关于比丘尼受戒的史料来探讨中国比丘尼教团的成立与戒律的关系以及中国比丘尼教团第二次成立与刘宋政权的宗教控制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庄圆的硕士学位论文《东晋南朝时期尼僧社会生活的历史考察——以〈比丘尼传〉为中心》，通过《比丘尼传》记载的比丘尼的籍贯地理、比丘尼的驻锡地以及尼寺的地理位置、比丘尼家庭出身、出家原因及修证成就、比丘尼僧官制度、比丘尼交游等内容论述东晋南朝时期比丘尼的社会生活。西北大学专门史专业周玉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早期比丘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专业吴艳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晋南北朝与唐代比丘尼僧团比较研究》都对《比丘尼传》中的史料进行了大量引用。杨孝蓉的《从〈比丘尼传〉看刘宋时期尼僧概况》，张子开的《〈比丘尼传〉所见蜀地尼僧传记及其语言学价值》，李传军的《从比丘尼律看两晋南北朝时期比丘尼的信仰与生活——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中心》等文章都是利用《比丘尼传》中记载的宝贵史料来进行有关问题的研究的。

在《比丘尼传》的研究的有关文章和书籍中，还有一些研究涉及《比丘尼传》的成书原因。比如：台湾李玉珍的硕士论文《唐代的比丘尼》中说：“尼传之写作与南朝梁武帝及梁简文帝两位皇帝有心整理当时佛教人物的资料有关。宝唱是为梁武帝和梁简文帝两位皇帝整理佛教传记的功臣。他奉梁武帝之命写《名僧传》；又为梁简文帝写《法集》、《续法轮论》等书，《比丘尼传》之写作亦当是这一连串整理佛教传记文献活动的一环。另外这与南朝比丘尼的势力可观亦有关系。根据《比丘尼传》的记载，尼宝贤曾任刘宋都邑僧正一职，这是当时京城地带管理僧人事务的最高职位。后代的比丘尼皆不会如此地风光过。南朝的比丘尼不但出入宫廷，而且还当朝讲经，或与人

辩论。后代的比丘尼虽亦有在宫中讲经的记录，但却局限在后宫。再者，在南朝社会中有比丘尼讲经的现象存在，但尼讲在唐时地已销声匿迹。而梁武帝为献太后追福，立大智度寺，设置五百比丘尼日夜讲诵经典，这般大的手笔即令是在唐代最崇比丘尼的武则天时代也不曾看到。《比丘尼传》的写作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吴季羣在《〈比丘尼传〉研究》一文中有相同的看法：“宝唱奉梁武帝之命编撰《名僧传》之后，又为简文帝编写《续法轮论》、《法集》、《经律异相》^①等。《比丘尼传》当即宝唱连续整理佛教传记等文献活动的成果之一。另者，尼传的编集与南朝比丘尼人才辈出和积极旺盛的活动力有关。六朝之际，王室和达官显贵重视尼僧，比丘尼出入宫闱，对皇室贵族讲经说法，受到皇室的推崇，地方官宦之家也常以襄助比丘尼，博取社会好感。几乎各朝代都有皇帝礼遇寺尼，常加供奉之事，使比丘尼教团在虔诚奉佛的主流文化中受到瞩目，人数越来越多，尼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千余人，她们在社会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也就愈来愈显著，形成庞大的群体，在此背景下，《比丘尼传》才得以出现。”曹仕邦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史：东晋至五代》一书第二章《梁武帝与中国佛教史学传统的建立》，探讨了萧梁时期中国佛教史传大量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佛教史传的产生“跟梁武帝御宇期间的俗世史学发展加上皇帝的宗教政策有关”^②。总而言之，上述三人都是从梁武帝个人对佛教的崇信这一角度来论证《比丘尼传》产生的原因，并且论述过于笼统和宽泛，不够深入。

对于《比丘尼传》作者梁代释宝唱的研究，目前的探讨很不够。白化文、李鼎霞的《〈经律异相〉及其主编释宝唱》一文，是宝唱生

① 《经律异相》成书于天监十五年。是梁武帝敕宝唱所撰，非简文帝萧纲敕撰。此处有误。

② 曹仕邦《中国佛教史学史：东晋至五代》，台湾法鼓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29页。

平事迹研究成果中的一篇力作。该文在主要考证了《经律异相》的主编是宝唱而非僧旻一事，大致按年代的先后，钩稽出了宝唱的生平。依据《续高僧传》，推论宝唱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至三年（467）之间；对宝唱的“不测其终”的结局作出了推论；对于宝唱的著述进行了系年。但是，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详细考证。《比丘尼传》作者宝唱是中国迄今为止，同撰有比丘、比丘尼二传，且皆留于今世之第一人。他同时又是一位高僧，著述繁富。宝唱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他出身寒微，却成为“江表僧望”僧祐的弟子；他是梁代帝王身边不可或缺的僧人，最终却“不知所终”。《续高僧传·宝唱传》只是粗略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对其出身、交游、撰述等等，往往语焉不详，且多有讹误之处。因此进一步弄清楚宝唱生平事迹，对于《比丘尼传》的研究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比丘尼传》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比丘尼传》进行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王孺童先生《比丘尼传校注》一书为代表。但是，《比丘尼传》的作者宝唱的生平事迹中有关问题还需考证，其生平事迹的进一步整理也有待完成。另一方面是从历史史料学的角度对《比丘尼传》中的不见于其他史籍的资料加以引用，从而来进行佛教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书籍很多，其中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等几本佛教历史书籍为代表。本书正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宝唱与《比丘尼传》这两个看似单独却又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的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宝唱的生平事迹中包含有《比丘尼传》的撰述，同时，《比丘尼传》的撰述也是与宝唱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经历有紧密的联系。本书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笔者认为厘清释宝唱的生平事迹是研究《比丘尼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宝唱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宝唱传》，该传记录了宝唱入佛门之前的生活，入佛门之后跟随其师

僧祐学习律学，撰述僧传以及帮助梁武帝编纂佛教书籍等事件，展现了宝唱虔诚奉佛、弘扬佛教、勤奋撰述的一生。但是，这篇僧传的缺点是叙事前后颠倒之处颇多，而且在宝唱的一些撰述书籍的时间记载上，与佛经目录上的记载不同，明显出现了错误。因此，本书第一章在《宝唱年谱》的基础上，对宝唱的生卒年、宝唱的交游等问题作出了考证，对宝唱的著述加以整理。我们认为，释宝唱是中国古代的佛教目录学家、佛教史传作家，在佛教义学上是一个以研究律学为主的律学僧人。

本书的第二章探讨《比丘尼传》产生的原因。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总有其客观和主观原因，本章正是遵循着这一思路来研究的。《比丘尼传》的产生有其时代因素和宝唱个人的主观条件两个方面。梁代佛教发展十分兴盛的时代氛围是《比丘尼传》能够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在梁代佛教发展兴旺的背景之下，却出现了僧尼不守戒律，比丘和比丘尼僧格的普遍沉沦，在这种情形之下，以研究律学为主的律学僧人宝唱为重振佛门戒律，更是为了给当时以及后世的比丘尼树立“典范”，这促使他撰述了《比丘尼传》。《比丘尼传》的产生也与以女性作为传主的传记书籍在宝唱之前已经出现有关，因此，本章同时也对两晋南北朝的僧侣传记书目和《比丘尼传》产生之前的女性传记书目进行了整理。

作为一部佛教历史人物传记书籍，宝唱撰述《比丘尼传》所使用的史料来自哪里呢？这是本书第三章要解决的问题。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主要是从历代僧传、正史史传、小说、类书以及墓志中辑录《比丘尼传》中没有立传的魏晋南北朝比丘尼的事迹。这一节写作目的主要是整理魏晋南北朝比丘尼的史料。第二节探讨《比丘尼传》的史料来源，《比丘尼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宝唱亲身见闻的材料，宝唱搜集并阅读过的书籍文献资料以及碑刻资料；因为《比丘尼传》在撰述的过程中使用了《宣验记》和《冥祥记》中的史料，所以本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比较《比丘尼传》与《宣验记》、《比丘

尼传》与《冥祥记》在使用同一史料时不同表述的原因，进而探讨宝唱撰述佛教史传的原则。宝唱撰史的原则是“不尚繁华，务存要实”，也即是“求真”、“求实”的撰史观念。

本书的第四章探讨《比丘尼传》的流传及影响。分别从佛教教内和教外书籍对《比丘尼传》的著录和《比丘尼传》对后世僧传写作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讨论，说明《比丘尼传》一书引起了后世对于比丘尼这一群体的重视和研究。

梁释宝唱是中国佛教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撰写了比丘传记，又创作了比丘尼传记的佛教史传作家；同时，《比丘尼传》的出现开创了为中土比丘尼立综合性传记的先例，释宝唱与《比丘尼传》在佛教历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但是，有关释宝唱与《比丘尼传》的研究还没有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中未涉及的或者论及却不够深入的问题，诸如，释宝唱的生平、著述，《比丘尼传》的成书原因，《比丘尼传》的史料来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期望本书能够对释宝唱与《比丘尼传》以及佛教史传研究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研究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本书在解决上述诸多问题的时候，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包括文献目录的著录、文献的考证、文献的辑佚和文献的比勘，力求做到把和宝唱与《比丘尼传》有关的资料作一个搜集、整理和辨证，以有利于宝唱《比丘尼传》的进一步研究。由于笔者对佛教理论知之甚少，因此，对于书中的大量史料无法展开深入的阐释，这是本书的遗憾之一。期待在未来的学习之中，对此有进一步的求索。